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第89期(民國104年9月),189-197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潘光哲,《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(一八三三~一八九八)》

臺北: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,2014。483頁。

徐佳貴*

西方「新文化史」意義上的「書籍史」或「閱讀史」取徑及相關成果,爲漢語地區學者及中國史學界所認知,已有不短的一段時間。這種認知總體呈現兩個向度:一爲「史學史」的向度,即將書籍史或閱讀史納入西方(尤其是法、美二國)史學自身的脈絡中去理解;一爲「理論方法」,即在西史以外的領域,尤其是中國史領域,藉以啓發新的思路,針對版本目錄學等的傳統取徑,摻入或代之以「文化史」的視角。前一種向度或可被認爲是後一種的基礎,只是在理論層面「援西入中」,常有「水土不服」的危險,如何充分利用本土證據,開展「實證」性質的相關研究,仍會對該領域學者理論結合實證的能力構成一大挑戰。

據筆者所見,現有可歸於此一方面的研究,大體集中於明末清初及晚清以降兩個時段;相應地,「書籍史」、「出版文化史」、「閱讀史」等稱謂的具體所指時有交錯,其中形成「專著」者,則多可名之以「書籍史」或「出版文化史」。至於閱讀史,多是作爲局部的方法思路爲人採用,或構成章節的一部份,或形成單篇論文。直到最近,這一情形才有了變化,中研院近史所潘光哲的《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(一八三三~一八九八)》一書面世,這是他在多年來相關論文的基礎上(論文發表的詳情,見「自序」頁iv-v),增益新的史

*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

料與理論思考，撰成的「漢語世界的第一部閱讀史專著」（前摺頁「內容簡介」）。該書聚焦於「閱讀」環節，將閱讀史理解爲最廣義的書籍史之一部；但閱讀亦非僅有的考察對象，而是作爲中心點，串聯起關乎書刊、資訊、知識觀念之傳播接受的各個歷史面相。閱讀行爲的主體，係晚清中國既有的知識菁英階層──「士人」；對應的知識內容，則爲外來之「西學」。而眾所周知，有關清季以來「西學東漸」的研究，早已是成果豐碩，那麼潘氏的這部著作又會從閱讀史的角度，給予我們何種新的啓示呢？

一

在第一章「導論」中，作者聲言全書的主旨：「如果意欲析論晚清士人如何因應世變的思想世界，書寫這幅歷史圖像的多重樣態，最好能夠詳密調查晚清中國士人的讀書天地，精確描寫他們的閱讀活動與思想／觀念之形成兩者間的互動過程，亦即，採取閱讀史的角度，結合出版史和書籍史的研究成果，進而爲晚清中國文化思想的敘史架構，建立更形堅實和深入的基礎」。（頁 5）具體來說，作者引用舒茲（Alfred Schütz）的「知識倉庫」（stock of knowledge）一語，將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描述成一個「知識倉庫」之建立、士人與此「倉庫」發生關聯的細緻而多歧之歷史過程。

首先是「倉庫」的建立。通常認爲，1815 年創辦於馬六甲的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》，是十九世紀第一份面向華人傳揚西學的刊物；但作者以實際發生的影響力爲標尺，認爲 1833 年創於廣州的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》，對魏源、梁廷枏等士林菁英發生眞確的影響，才是本書所述閱讀史的起點。（頁 51）此後西人推出《美理哥合省國志略》、《大英國志》等書，與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》一道爲「知識倉庫」打下堅實的「地基」（頁 52）；稍後中國官員士人亦開始介入，在出洋遊歷或閱讀西學書籍的基礎上，投身相關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。類似的情形後又發生在《普法戰紀》、《日本國志》、《萬國史記》等士人或外人所撰的西學讀物身上，這便形成了一條不斷向後傳遞的知識之

鏈，但鏈條的各環節並非取代與被取代的關係，而是均可被歸入同一座「知識倉庫」中，爲時人與後人取用。當然，士林讀者自身對於知識觀念的「過濾」、曲解與加工，同樣時常可見；不同的讀者對於此類庫存往往有不同感受，這一面當是基於其主體性或個人閱歷，一面則關涉所謂「書本地理學」，即書刊的生產流通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，使得士人入「庫」、一覽「宮室之美富」的成本與可能性往往存在差別。

「書本地理學」多半構成制約因素，但換個角度講，從事閱讀的士人尚可掙脫自身所處空間的限制，馳騁所謂「地理想像」。在此一面，作者以浙江金華學者朱一新的《無邪堂答問》爲中心，說明如朱氏這樣的中小級別士人，亦可在讀書過程中「以西證中」、「中西互證」，表明在他們看來，外來之西學也已成爲一種值得信賴的「知識」。不單如是，朱一新對於西學既有汲引亦有拒斥，由此參與、形塑與近代「國族危機」配套的一系列地理觀念，並將之貢獻於此一公共性的「知識倉庫」，成爲當時如楊度等年紀較輕的讀書人接引西學的基礎。

至中日甲午戰後，近代報刊媒介始以更強勢的姿態，進入更多士人的生活與精神世界。汪康年、梁啓超等主持的上海《時務報》，無疑是個中翹楚、「業界標杆」，遂成爲本書第四章重點考察的對象。與以往聚焦出版與編撰環節不同，此處核心在「讀書社群」的形成以及讀者、編者之互動。一方面，當時《時務報》受到廣泛稱許，乃至《時務報》的內容被《經世文編》等傳統體裁廣爲複製與再加工。在另一面，士林讀者亦對《時務報》提供支持幫助，並提出諸多建議批評；這些建言批評不僅有正面意義，且彰顯某種「思想觀念體系／價值系統的衝突」，而對報務發生負面影響。（頁 195）作者繼以《時務報》譯稿爲例，指出「西學」且有「新聞化」的趨勢，強調時效性的報刊新聞，不時被逕自轉化爲更具恆久價值的「知識」。（頁 207-208）總之，在維新時期，更多士人得以置身此一新型媒介構建的「公共空間」，在其間探索「世界知識」，進而藉以摶塑或豐富他們對於自身「國族」及「世界」大勢的認知。

除卻媒介之變遷，尚有關乎「制度」的面相。第五章作者即以維新時期湖南學政江標所編《沅湘通藝錄》爲中心，探討變科舉之議勃興的背景下，「西學」可能具有的「體制空間」。概言之，西學這一「新酒」如何納入科舉之「舊瓶」，尚須趨新官員與應考士子費心摸索、並彼此展開博弈；就此作者對《沅湘通藝錄》所載湖湘士子的策論進行了極爲細緻的梳理，析論士子可能採取了何種答題策略，對策可能借鑑、乃至大段照搬了何種流行的西學書刊，西學書刊又是具體如何爲應試者提供新的語彙與觀念的。不僅如此，西學既已與「利祿之路」掛鉤，相關「文化市場」的蓬勃，乃至西學書刊的盜印翻刻之風盛行，也便成了題中應有之義。最終，《沅湘通藝錄》自身同樣成爲「知識倉庫」的一部份，並成爲「『文化市場』牟利逐益之資本」，爲更多士人所接觸閱讀；而當西學在基本的取才制度中求得生存空間，其在中土的拓展前景，已然更形廣闊。（頁 280）

1897 年末，徐仁鑄接替江標爲湖南學政，繼續試行科舉改革，督導士子勤習策論，應試士子於是主動或被強行拉入此一「知識倉庫」，乃至開始養成「就報刊求西學」之類的閱讀習慣。只是對這些更多也更顯普通的讀書人而言，自行摸索難免事倍功半，幸賴有梁啓超《西學書目表》之類的讀物出現，樹立了指點迷津的「典範」。相應地，《西學書目表》及與之配套的〈讀西學書法〉，也成爲之後西學門徑書的一則藍本；「翼教」士人葉德輝等的猛烈批評，亦未扭轉這一關於西學之「讀書秩序」的建立趨勢。可是，士人對於此類讀物指示的路向，也從來不會「奉爲絕對之圭臬」（頁 327），乃至後來的門徑讀物作者亦會基於自身的閱讀體驗而得出創見，從而促成在此「倉庫」中的遊覽路徑不斷發生調適改變。

至世紀之交，日本管道日益受到重視，「東學」開始衝擊乃至取代此前「西學」所扮演的角色；於是，「約略從 1830 年代末期開始建設大業的『知識倉庫』，即便屹立多年，在新時代的浪潮侵蝕之下，恐怕再也支撐不住了」。（頁 346）基於這一判斷，1898 這個近代「通史」書寫中饒富意味的年份也便成爲

閱讀史的一個節點，爲本書的階段性考察圈上了一個句號。

二

綜上可見，本書的閱讀史敘寫，其一是圍繞「知識倉庫」相關的「建築」過程：首先是「打地基」，之後庫存日形豐富，「媒介」（近代報刊）與「制度」（科舉）要素亦介入其中，進而引起士林中人對於「讀書秩序」的不懈追尋。而士人的「閱讀」行爲在其間，不光意味著對西學的汲引接受，同時也意味著知識觀念的生產與再生產，反過來又充實或調整了這一具有公共意義的「知識倉庫」之庫存。其二，則是圍繞士人與此「知識倉庫」的互動內容，讀者的主體性與各自的客觀境遇反映在關涉「地理想像」、近代國族之建構等重大議題的言說實踐中，從而引致了此類互動以及庫存本身紛繁多歧的樣貌。若作一字面意義的比喻，以上的「其一」可視爲「脈」，「其二」可視爲「絡」，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千頭萬緒，卻非一團亂麻，在確保思路清晰的同時，作者尚可基於本土複雜多歧的證據，回應閱讀史名家羅伯・丹屯（Robert Darnton）提出的核心問題：「流變不已的讀者群，如何建構不斷變化的文本意義？」（頁 5）

這種回答誠如作者所云，主要是「出以個案研究」，故與通常講求所謂「總體模式」的「通史」有異。（頁 6）與之相應，前文所稱的「脈」與「絡」，也同樣不能混同於傳統思想學術史所慣於展現的線性意象，反而是對此意象作出的有效反思。可以說，以往的做法，多是將如白雲般零碎地浮於高空的知識思想，以某種內在關聯串接起來；而在閱讀史思路的關照下，這些內容連帶其物質載體被拉回地面，相應闡釋空間的形成演變，亦被納入特定的歷史時空進行全面細緻的考察。援用作者自己的措辭，「西學」乃是作爲一類「思想資源」，儲於「知識倉庫」，該倉庫具有原則上的公共與開放性，只是在具體的實踐中，尚有「書本地理學」、制度環境及既存觀念／意識形態與價值系統的重重制約。儘管如此，西學所激發的「概念變遷」，亦不見得是「傳承有序」的（頁 380）；

近代思想史中的「要角」之所以發生影響、知識倉庫中的「重量級著作」之所以「重量級」，實際均是一個包含著複雜多歧的互動與博弈之過程。

在具體操作中，作者還借鑑了闡釋人類學的思路，對此作「濃描細寫」〔即 thick description，又譯「深描」，係作者引自克利弗德．紀爾茲（Clifford Geertz）的概念〕之法，進而並給出開放性的結論，方才更貼合眞確的歷史情境。畢竟，身處「數千年未有之變局」的傳統讀書人如何通過閱讀西學，編織各自多樣的「意義之網」（作者引紀爾茲語，見頁 382），從根本上就不應被基於某種「後見之明」而作出的單一指向之敘述所簡化（如指向「現代化」、指向革命、「進步」、「啓蒙」等）。但也不是說，一切宏大敘事均是不可靠或無必要的，而是「閱讀形式」的變化、新「閱讀模式」的形成（丹屯語，頁 381），對大時代變遷既造成可能，又對可能性造成限制；而其總體上溢出大事件本身的可能性，亦須盡力納入其原初的歷史脈絡，作盡可能充分完整的揭示。

與此盡力「脈絡化」（頁 378）的願景相應，本書固然貫穿著某種理論關懷，卻也一樣要植根於對相關史料的細密考證（包括與域外研究的適度比較）。除正文大量注釋、文本比對外，這份實證精神還彰顯於文末的附錄以及人名／書名索引中（尤其是附錄中對《汪康年師友書劄》所收信函之繫年的考證）。借用作者所引豪斯曼（Alfred Edward Housman）的話：「精確是義務，而不是美德」（頁 24-25），理論對實證研究構成啓發，又在實證基礎上評估理論的適用度，本是援引外來理論方法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的「份內之事」；就此而論，這一部閱讀史專著也以其扎實的求證過程，為未來有意於此道者提供一個深可借鑑的範本。

三

當然，據筆者所見，本書尙存在一些問題——儘管嚴格說來這些問題並非「缺陷」。第一個問題便是「知識倉庫」一語。如上所述，這一詞組引自西方學者，而落實到書中「本土化」的運用，作者也毫不諱言這是一則「譬喻」。

（如頁 379）亦即串起全書內容的，主要是一則研究者自設的比喻，故仍會存在將喻體的運作邏輯混同於實際歷史進程之風險。或許對於作者而言更大的麻煩在於，若將這一譬喻取消，此番的閱讀史直將「無從寫起」，頭緒徹底無可清理；畢竟，完全一盤散沙或「原生態」的「情景再現」，亦非歷史書寫之目的，如何在藉助後設概念語彙的架構與盡力脈絡化（或曰「語境化」）的願景之間求得一平衡點，仍會是希圖在理論上「援西入中」的中國史學者所要不斷深究的一個課題。

進一步講，譬喻誠然有其正當性，將戊戌維新之後的「東學」歸於一新設的「知識倉庫」，可能也有商榷的餘地。實際上，本書的討論已涉及一些東來書籍，而「東學」其後之所以對中國發生深刻影響，主要也是因爲其受「西學」影響、或在傳入之西學的基礎上予以「本土化」的部份，而非與中土學術本來聲氣相通（或至少被士人認爲聲氣相通）的「古學」部份。若仍使用「知識倉庫」的譬喻，更準確的說法當是在既有的倉庫內另辟「庫房」、集中存儲，而一些早先入庫的西學資源，固然仍在庫中，卻已開始遭受黴變蟲蛀之末運。至科舉停廢、學堂廣興，一些庫存才被移入更顯堂皇的新倉庫，並以新的學科體系重新分類存放、爲人取用。不過，新舊倉庫中仍有新的西來之西學充入，「西學」並未被「東學」完全取代；至新文化五四運動時期，歐美學術知識資源復大量流入中土，就此新階段的閱讀史而言，「東學」的光芒也顯然不會再有清季十年那般奪目。

第二個問題，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當是一個絕大的主題，據筆者所見，尙有一些面重要面向本書並未涉及或深入。首先是關涉西學的「文本」。作者的討論集中於菁英文本，對於通俗類文本關注似不太夠。如清末士人創作的白話宣傳文字、小說、戲劇（曲）等，當士人在此類創作中摻入西學內容，其對「雅」、「俗」關係，或自身作爲「士」與其他社會階層之關係的理解（或重新理解）及發揮，又與其西學閱讀存在何種關聯？這些文類本身又引起了哪些讀者怎樣的迴響？具體到本文所涉時段，如 1895 年傅蘭雅組織的時新小說徵

文競賽，有不少文人投稿，今已彙編成《清末時新小說集》出版。[1]若以這批材料爲中心，剖析小說作者原初作爲「讀者」，對西學的認知如何反映在對「時新」小說體裁的認識乃至小說內容中；以及後來作爲「作者」，又激發了怎樣的讀者反應，當可爲此時段或整個近代的閱讀史研究再添饒富意味的一筆。另方面，一些特定門類的西學書籍，如科技、醫藥衛生和軍事技術類書籍的閱讀史，似也需要專門梳理；且士人對此類書籍的閱讀感受，不光是義理上或關乎一般的價值判斷的，許多時候也涉及其對技術性知識的探討以及對「技術」本身的態度變遷，需要另行分析。連帶一個要點是，今人通常的印象，是當時「書目式西學」、「報刊式西學」往往都甚淺薄，儘管不好憑藉某種「後見之明」對此大加指摘，但相關的主要依託士人所編書目及報刊的西學生產方式，是否也要進行足具批判性的分析討論呢？[2]

其次，是閱讀西學的「士人」。即與「文本」的多樣性類似，作爲閱讀主體的「士人」也非鐵板一塊。部份有西文閱讀能力的士人，如曾紀澤、何啓、胡禮垣、嚴復等，他們的西學閱讀與其他一般士人有何同異，彼此間又曾有過何種互動或相互影響？而關於維新時期的西學閱讀，本書重點關注康梁一系及湖南的狀況；但當時整個士林內部，乃至所謂「維新」陣營內部亦是紛歧迭出，除位於舞臺中心的幾位維新派人物外，也不光只有葉德輝等「翼教」者的「螳臂擋車」之舉，「新」、「舊」分野本身，亦與今人的理解大有差異。經常是各人在各自的閱讀經驗基礎上，各有對於「維新」或王朝／國族之未來的規劃想像，這種不容漠視的複雜性，似也有待在閱讀史的思路參照下作進一步的梳理。

總之瑕不掩瑜，上述所謂問題，多半也是「苛求」，該不是一部開拓性的閱讀史專著就能解決的。只是管見所及，還想補充幾個細節上的小問題。首先，本書第四章，以代銷《時務報》的士人繳回報資偏少，證明代售報刊獲利豐厚

1　周欣平主編，《清末時新小說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）。

2　這種生產方式，也許可以部份地以「策論化」名之，現已有研究者就清季廢八股、主試策論中所謂「資訊」與「知識」的同異問題作過詳細的分析，見劉龍心，〈從科舉到學堂──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（1901-1905）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 58（2007 年 12 月），頁 105-139。

（頁 175）；但繳回報費甚少，亦可能是由於拖欠報資，不一定盡是代售者的「提成」所致。其次，「附錄三：瞿鴻機繫年考」提及的「愚初」（頁 390），《汪康年師友書箚》的編者亦未考出，[3]據筆者所見，似即浙省溫州府平陽縣士人黃慶澄（字源初，一作虞初、愚初，《中西普通書目表》的作者）。第三，因附註的資訊量很大、很重要，章末注釋似不便於讀者，頁下注會更便於檢索查對。

最後再補充幾則校對與排印上的錯誤。頁 6 第 13 行，「對史家的才識考驗」應爲「對史家才識的考驗」；同頁倒數第 4-3 行，「方興正艾」應爲「方興未艾」；頁 8 第 6 行「如何」後應爲句號；頁 9 第 14-15 行「更爲我們理解與反思……的複雜樣態」，應爲「更對我們……」；頁 13 第 10-11 行「風魔一時」應爲「風靡一時」；頁 15 第 17 行「“衛生”」應改正體引號，頁 38 注 99、注 101 存在同樣問題；頁 50 第 11 行「督基教」應爲「基督教」；頁 67 倒數第 2 行「《瀛寰志略》」後應爲頓號；頁 77 第 13-14 行「或爲可視」應爲「或可視爲」；頁 89 第 18 行「聖道王制」後應爲頓號；頁 123 第 8 行「賦與」應爲「賦予」；頁 171 第 12 行「共同開辦的報刊」後應爲逗號；頁 197 倒數第 2 行「非將孫中山與……」應爲「非將孫中山以……」；頁 209 倒數第 1 行「倒底」應爲「到底」；頁 255 倒數第 3 行「隸籍善化」後應加「的」；頁 278 第 17 行「十之七人」查對原文，應爲「十之七八」；頁 309 第 6 行「湘三子弟」應爲「三湘子弟」；頁 373 倒數第 1 行「滋味」前應加「的」；頁 334 第 2 行「文筆較道」查對原文，應爲「文筆較遒」；頁 375 第 1 行「新事務」應爲「新事物」，倒數第 4 行「恁憑」應爲「任憑」。

---

[3] 《書箚》編者原將「黃慶澄」與「黃虞初」分列，見上海圖書館編，《汪康年師友書箚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），冊 4，「人名索引」，頁 195-196。